

“两个必然”论断的生态维度解析

——兼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董玉宽,努尔麦麦提·吐尔孙,祁琪

(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8)

摘要:立足于唯物史观的“两个必然”论断,以“两个必然”论断的生态维度和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并从3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论述了“两个必然”论断的理论内涵;论述了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对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评析。分析了“两个必然”论断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更替的历史必然性,为理解“两个必然”论断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两个必然”;生态危机;生态维度;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更替的“两个必然”论断,最早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为“不可避免”:“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判断后来被简称为“两个必然”论断,至今已历时170多年,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制度之间的矛盾层面。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生态问题的凸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就需要检查和批判人类现行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为理解“两个必然”论断提供一个生态维度。

一、“两个必然”论断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其产生和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两个必然”论断反映了

历史观的唯物性,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人类自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有制的顶峰,无法在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容纳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局部制度调整并不能解决其根本矛盾,而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所有制问题,由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表现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阐述“两个必然”论断奠定了客观基础。

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肯定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旧社会形态的退出和新社会形态的登台由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两个决不会”^[2]正是对这一历史发展规

收稿日期:2019-12-27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7AZX002)

作者简介:董玉宽(1965—),男,辽宁大连人,教授,博士。

律客观过程的表达。看似与“两个必然”相矛盾,但都源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因此两者是一致的,“两个必然”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远景趋势,“两个决不会”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长期性,都是客观必然的。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看,“两个必然”是对生产关系的更替的判断,指出了生产关系变更的历史必然性,任何形态的生产关系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必然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两个决不会”则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完全发挥了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后才会走向灭亡的客观前提。生产力角度的“两个决不会”论断是对生产关系角度的“两个必然”论断的进一步阐释,使得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表达更为明确、更加全面和更加科学。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僵化地理解“两个必然”的判断,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知是教条主义的。对于某个具体地域,如俄国,马克思认为其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3]。面对俄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革命形势,如果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而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则既辜负了广大人民的奋斗和牺牲,也会贻误社会制度更替的时机,所以在这些国家,可以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并非是对唯物史观的背离,而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践行。马克思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给予了肯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破除了对“两个必然”论断的形而上学理解,为落后国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当前的国际现实来看,“两个必然”论断所表达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正在东西方社会得到印证。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所带来的民粹主义高涨

的现象,其背后是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实质,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生态和社会危机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成功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激发和容纳生产力的生机与活力,也直接证明了“两个必然”论断的真理性,尤其是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贡献,体现了全球治理方案中的“中国智慧”^[4]。

二、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福斯特认为,当前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制度的更替,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结论在表述上与“两个必然”论断相同,因为福斯特认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5]。

对于福斯特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自由”“实践”等核心概念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学者郭剑仁^[6]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建立起人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新的哲学本体论。”福斯特以辩证唯物主义所确立的物质先在性为理论前提,认为生态自然作为客观存在,具有先在性、独立性和规律性,人类是在生态自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自身的自由意志,进行社会实践。

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福斯特认为,自然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而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赖于自然的存在而存在,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因而,人类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物质性的自然系统,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是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和以自然为前提的生产^[5]。因为自然的这种先在性和基础性,福斯特认为,自然本身的独立性是不依赖于人的,其运行规律自然将人类包含于其中,这种人与自

然的本真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扭曲,例如,对于人而言,食物的营养才是其本性,而非食物的利润,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取利润却往往要牺牲其营养价值;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将原本公共的自然资源变为私有财产,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唯一的利益关系,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7]。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福斯特借用马克思这一对“劳动”的基本判断,而且将其具体化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新陈代谢,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表现为经济循环^[5]。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生态关系,福斯特认为,自然环境之于人并非外在的资源库,而应该成为道德的对象,因而,可以建立类似“大地伦理”的生态道德和文化,承认自然有其自身的权利,自然物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人类行为不当破坏自然的生态过程。同时,福斯特并未停留于构建他的“大地伦理”,因为他“明确地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应该关注更加广泛的、共同进化的、复杂的物质实践关系”^[9]。基于对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的认知,福斯特强调各种反抗资本主义力量的凝聚,因为各种力量反抗的对象只有一个,无论是民众被压迫还是生态环境被压迫,都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利润的贪得无厌,生态运动“必须从劳动人民和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等级制度最底层的群体的斗争中汲取动力”^[10]。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源自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因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解决生态危机是不可能的,要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只能进行社会革命,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因此,福斯特强调生态运动要走向生态革命,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全球生态革命的长期战略是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即为了社会主义而斗争”^[9]。单纯的环保运动不可能实现环保的目标,应当将环保运动与社

会主义运动相结合,寻求社会制度的更替,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杜绝为了追逐利润的浪费性生产,才能纠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才能真正消灭生态危机,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也保护人类自身。资本主义制度走到了私有制的顶峰,将自然系统对象化,认为自然系统是外在于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因此,可以将自然中的一切当成商品,实现私有化,并可以用于交换。那么公共领域如何存在?福斯特认为,只有使自然和生产社会化,才能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一定范围内的公共领域,让普通人能够利用到公共资源。生产的社会化导致自然的社会化,“生态革命必然导致社会革命”^[7]。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危机的解决除了要进行社会制度更替的革命以外,还需要打破政权与资本之间的共谋。资本主义制度在面临社会和环境价值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时,通常会选择经济增长而放弃社会和环境价值,决策层并不愿意采取有效而长远的环保政策和措施。因此,需要将国家政权从资本的绑架中解脱出来,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预期目的^[9]。对于生态革命的前途,福斯特认为,“真正的生态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是生态革命”^[11]。因此,福斯特明确地举起了生态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呼吁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阐述与“两个决不会”亦有相似之处。而社会主义“它必须以人为本,特别是要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必须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12]。福斯特赞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生产关系的设想:“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13],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人类才能建立合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关系,而且福斯特还认为,即便是在经济运行中市场依然发挥作用,也是处于从属而非支配的地位。

关于当前的发展问题,福斯特也没有在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采取二选一的方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为他既反对不加区别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也反对限制增长以保护生态环境。他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具体实际情况,无论是贫富差别还是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巨大差别,应该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更多的空间,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和方式,“贫困不会自动消除,这需要有更多的政府在优先考虑贫困人口的前提下主导发展本国经济”^[11]。

三、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

福斯特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视角阐述了生态危机的根源,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广泛争议,既赞誉其有勇气、有创见,同时也饱受争议^[9]。从福斯特的文本和阐述看,他对生态危机的研究是基于马克思的文本,其生态学思想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可视为打开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角,“即把生态问题作为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来解释马克思”^[5],构建起了具有独创性的生态思想。福斯特的论证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定位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在福斯特看来,反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也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理解“两个必然”论断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一,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福斯特将唯物主义进行了3个层次的区分:在本体论上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即社会存在依赖于自然;在认识论上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结果的超事实性;在实践层面上强调变革力量的作用。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包含了这3个层次,将唯物主义与自然的客观性联系起来,“任何把唯物主义与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相分离的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反对”^[14],由此导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第二,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源。资

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私有制,资本逻辑是社会的根本运行规则,生态问题的解决也要束缚于资本逻辑,这才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源,即便是所谓的“绿色技术”,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的破坏。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便是有益于生态环境的技术,也要从属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否则不会被社会化,“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

当然,在肯定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撇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单纯讨论生态危机是机械的。福斯特认为,既然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那么生态危机就具有必然性,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而马克思在分析生态危机时,是将其与经济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认为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都根源于资本的逻辑,二者是同源的,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鉴于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将生态危机作为焦点予以关注是可行的,但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经济危机,仅仅从制度层面讨论生态危机,就无法抓住生态危机的根本,更不能把这种理解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推理结论。从这个角度看,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机械的。

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等问题并没有在理论上作出严格的论证。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认为资本主义是无法根除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也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于上述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可以说,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缺陷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论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对于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何以能够消除生态危机,则并未作出细致的阐述。

四、结 语

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论断是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提出的,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阐述,凸显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和历史必然性,从生态危机的层面阐述了社会所有制从私有制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过渡到公有制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福斯特将全球性生态危机提升到与全球性经济危机同等的位置,如果完全接受这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生态维度理解,就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因此,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可以参考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积极成分,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批判地吸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 朱炳元. “两个必然”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J]. 红旗文稿,2019(6):17-20.
[5]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6] 郭剑仁. 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 FOSTER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9.
[8]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康瑞华. 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 FOSTER J B. Organizing ecological revolution [J]. Monthly review,2005(5):1-11.
[11] FOSTER J B. Why ecological revolution? [J]. Monthly review,2010(8):1-14.
[12] FOSTER J B.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13]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14] 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Interpretations on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s from“Two Necessities” Argument: Comments on John Bellamy Foster’s Ecological Marxism

DONG Yukuan, Nurmatamat · TUERSUN, QI Qi
(School of Marxism,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 Necessities” argu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s of “Two Necessities” argument as the research target, and illustrates them in terms of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Two Necessities” argument; the second is to discuss the core content of Foster’s ecological Marxism; the third is to give comments on the Foster’s ecological Marx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wo Necessities” argument as well as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the replacement of social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wo Necessities” argument.
Key words: “Two Necessities” argument;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dimensions; Foster; ecological Marxism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